



《中华再造善本》中附加信息刍议^{*}

Discussions on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published Rare Books

王阿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传承文明、保护善本的一项重大举措,可使中华孤本秘籍分身有术,源远流长。《中华再造善本》中的附加信息还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底本的馆藏信息、装帧形式、书叶纸质及帘纹、版框缩放比例、修复情况、原有装具信息、与再造善本的色差说明信息,使再造善本真实、全面、翔实地反映底本的所有信息,为相关研究人员研究史料和古籍辨伪提供查检线索和佐证。

[关键词] 中华再造善本 再印本 附加信息

[中图分类号] G255.1 [文献标识码] B

[Abstract] 'Project of Chinese Republished Rare Books' is a great measure of inheriting civilization and protecting rare books. Besides curren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published Rare Books should include follow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binding form, the page paper and pattern, frame scale, restoration situation, original apparel information and color aberration explanation. All of the information could reflect the information of original books veritably, roundly and faithfully, and provid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ers and searching clues and evidence for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Republished Rare Books; Republic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1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之缘起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传统,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的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和民族精神宝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古籍散失、损毁情况严重。清代著名的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千里(名广圻,以字行)就亲见不少收藏宏富的大藏书家到最后珍本秘笈尽散,片纸无存,连距当时不过八百到五百多年的宋元刊本也已“万不存一”^[1]。而明清年间钱曾(字遵王)、季振宜(字沧苇)、徐乾学(字健庵)、毛扆(字斧季)四大藏书家的收藏也不过“十存二三”^[1],故而其大声疾呼“举断不可少之书,复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1]。这就是古人影刻宋元古本、令古籍善本广行于世的缘由。

目前,古籍善本同样濒临失传的危险,而且有日趋严重之势。为此,国家文化部、财政部会同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提出兼顾文物保护与利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本着“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以古

籍善本的安全保护、开发利用为出发点,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为目的,坚持“统筹规划,兼顾抢救、保护与利用,先易后难,滚动发展”的原则,对甄选出的善本进行分期分批再造。到目前为止,“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一期工程已按计划完成758种、1394函、8990册再造善本的出版工作,第二期工程进展顺利。

2 《中华再造善本》应附加的其他信息

再造善本之底本被各馆珍若拱壁,难得一见,正如清代学者叶德辉(字焕彬)所言:“盖一人独赏之物,不如千人共见之物之足征信。”^[2]如今再造善本的出版将一人独赏之物呈现给千人共见,实为难能可贵。但是通过对四川大学图书馆所收《中华再造善本》相关信息的了解并结合部分读者的反馈情况可知,《中华再造善本》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还应以“基于底本、反映历史”为原则,再增加以下附属信息,以便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再造善本的底本信息。

2.1 馆藏信息

尽管在善本再造过程中要求尽可能选择卷帙完整的底

^{*} 本文系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华再造善本》中附加信息研究”,项目编号:2010SKQ04;四川大学2009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科科研项目“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古籍修复研究成果分析”的研究成果。

本,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书叶残缺、漫漶、缺叶等情况,这就会出现同一部古籍的再造善本底本有多种的情况。因此,配补善本的馆藏信息应作为再造善本的附属信息,以全面反映再造善本的整体情况,为读者提供详尽的善本馆藏地,以便查访。此外,还有些善本有残缺而且因种种原因无法完璧或合拢,这时应写清楚散失卷帙的现存地和相关信息。例如,《东坡集》四十卷(南宋孝宗年间杭州刊大字本)现存四部皆为残本,其中两部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残本三十卷),一部存于日本公文书馆第一部(残本二十三卷),一部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残本三十卷)^[3]。如果这四部按阙逸卷次合璧,则可得到《东坡集》四十卷之宋刊全本。虽然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残宋本东坡集三十卷》已影印出版,但是笔者认为还应在其附加信息中注明日本所存两部之详细地址和存卷数,以便读者查访。而散失善本的相关信息可以从一些知名学者(如严绍璁、王重民、钱存训等先生)所编的国外藏中文善本书目中获得。

2.2 装帧形式

出于美观或阅读习惯的需要,有的善本在进行再造时需要原有的装帧形式进行改变。例如,白话文先生就曾对再造后的敦煌遗书大加称赞,认为其比原有的不裱无轴的三张黄纸底本还要耐看^[4]。而对于古籍来说,其装帧形式不仅是古籍出版印刷史的见证,还是不同种类古籍之间区分的重要标志,而且一些特殊装帧形式的古籍还能反映其藏家为何人。例如,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为爱书、护书、传书需要,对所藏宋元善本择良工精心整补,独创了古籍装帧中的“黄装”形式,即将无字的一叶粘在一起,似蝴蝶装,书叶四周镶出保护页,似金镶玉,加装书皮后从外形上来看又似包背装。因此,在进行善本再造过程中,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再造本的装帧形式发生了改变,都应该在附加信息中加以说明,以便读者对不同版本的古籍进行研究考证。

2.3 书叶纸质及帘纹

再造善本的底本用纸种类繁多,单是宣纸就可从选料上分为棉料、净皮、特净,从厚度上分为单宣、夹宣、二层夹、三层夹等。古籍的纸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印制年代,可以为古籍辨伪提供佐证。例如,宋版书大多用麻纸,也有用构皮纸和竹纸,明代官方刻书主要用皮纸和白棉纸,清古籍绝大多数用竹纸。此外,古籍的纸质也可反映其印制属地,如我国南方产竹,由竹纸印制的古籍也多来自南方。

另外,古籍用纸在抄制过程中形成的帘纹又可分为单丝路、双丝路、罗纹、龟纹。帘纹是古代造纸思想和工艺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判断古籍年代的有力佐证。例如,国家图书馆的杜伟生老师指出,纸上无帘纹的敦煌遗书多数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献^[5]。此外,还有学者对古籍帘纹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认定南宋麻纸帘纹宽4.1厘米,元朝藏经纸

帘纹不显,明朝皮纸帘纹宽2.2厘米,明朝发笈纸帘纹不显,明朝皮纸帘纹宽2.4厘米^[6]。刊印于康熙年间的《新编南词定律》所用纸张为罕见的开化罗纹纸。众所周知,开化纸与罗纹纸虽有其相同之处,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如开化纸日久会因自然氧化出现斑点,罗纹纸具有其他纸张不具备的显著的帘纹。而《新编南词定律》用纸不仅帘纹清晰而且氧化斑点明显,应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新奇品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然而,目前再造后的善本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无法将底本的纸质和帘纹完全反映出来。因此,作为古籍年代判定、真伪鉴定极为有力佐证的纸质和帘纹信息就需要在再造善本的附加信息中加以详细说明。

2.4 版框缩放比例

古籍版式包括版框、边栏、行款、书口等信息。在进行善本再造过程中,一般不会对边栏、行款、书口等作改动。而版框则不同,善本再造过程中对于原版框大小符合制版要求者,一律保存旧貌,不作任何改动;如果底本版框过大,就要加以紧缩,因此底本的版框大小无法在再造善本中真实再现。底本的版框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再造善本》的做法是,在再造善本的首页辑封处作牌记加以说明。例如,再造本《梁昭明太子文集》的题记为“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周滿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六釐米,寬十六.一釐米。”^[7]虽然在题记中对底本的版框大小进行了说明,但笔者认为再造过程中如果对原底本版框加以紧缩,还应在此处添加缩放比例。此外,笔者通过抽查发现,再造善本对于版框的度量未有统一标准,如前所述的《梁昭明太子文集》的版框大小以内框为度量基准,而《风俗通义》(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与《古乐府》(元至正刻明修本)题记中的版框大小却是以外框为基准的。因此,在以后的再造善本过程中,不仅需要将底本与再造本的缩放比例作为不可或缺的信息附于再造善本之后,还应应对版框的度量标准加以严格要求,以求科学、统一。

2.5 修复情况

古籍善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诸如酸化、水浸、火烧、霉烂、虫蛀、鼠啮等的损坏。历代藏书家为了古籍的源远流长往往会对古籍进行修复。部分再造善本的底本也存在数次修复的经历,因此不同时代的修复技艺和修复理念直接反映于修复后的古籍中。国家图书馆的张平先生在对敦煌遗书进行修复时就从修复用纸中总结出了古人的修复理念,即修复破损了的经卷要选用与经卷纸张相同的纸张作为补纸,并且补纸的厚度不得低于经卷的纸张厚度,粘补面积要大大超过破损面积^[8]。再如,自从我国古籍修复界基本确立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后,就不再对修复后的古籍进行划栏补字,而保留其缺失文字或

图像的部分,在修复工作中只是修复和加固古籍的残破部分,而不使古籍其他部分的现有性状发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但是在此之前的很多古籍无论是在封建王朝时期还是近代前期,都仿照字画修复领域采用的“接笔”和“全画”方法,严重破坏了古籍的真实性。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是否经补笔来判断某一古籍被收藏、修复的大致年代,因此古籍的修复史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流传、保存史的真实反映。而目前再造善本中未对其底本的修复情况进行说明,可以说这是对底本信息的不完全反映。因此,再造善本中应附带有对底本修复史的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古乐府》(元至正刻明修本)的衬叶中影印了其底本中的一张题签,该题签(水笔手写)详细记录了该书的目录,并在目录中注明残破、抄配、蠹修的具体页码,在结尾处进行了总计。该题签中对于破损、修复信息的记录正是印证其版本源流的有力证据。

2.6 原有装具信息

再造善本底本的原有装具信息包括:底本采用何种装具(夹板、四合套、六合套、云套、木盒)、装具所用材质(绫、罗、绸、缎、棉布)、装具材质的具体色泽与工艺等,这些信息都体现了历代藏家对图书保护、保存的认识和理念。国家图书馆馆藏《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上开式方形木质书盒,内放4个卷轴;而于敏中写本《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经》为上开式长方形木盒,下有底座专门用于盛放佛经。在函套的材质方面,《御笔菩提叶笺心经并题句》采用内外花色一致的织锦封面和函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是书衣为素色,函套有花纹。此外,还有些古籍书盒的底座也十分考究,如《大宝积经如来会》为上开式长方形木质书盒,外侧雕有花纹;有些古籍装具颇具匠心,如《乐善堂文钞序》为黑漆描金双龙戏珠提匣,前开式,有提梁,书盒内分为十几层,每层放1册书。不同的装具式样不仅是当时制作工艺的真实反映,可以为考古工作者提供实物史料,同时也是古籍迁移、流转的见证。例如,1933年古物南运之前就曾专门为敦煌遗书定做了一批带抽屉的木柜,放置于紫红色木箱内。而这批带抽屉的木柜现今成为当时南迁敦煌遗书的见证者。

此外,有的古籍装具或因其造型各异、别具匠心,或因其出自名家之手(有可能在装具上留下制作者姓名、制作日期等信息)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珍贵的史料信息来源。因此,在再造善本中附加上装具信息对于文物研究、考古人员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工作起到较大辅助作用。

2.7 与再造善本的色差说明

一般善本由于存世时间较久,纸质会发黄变色,而今善本在进行再造时一般都采用黑白两色印刷,不仅丧失了底本原有的风韵与历史感,而且还将其底本的纸质信息一同泯灭。众所周知,纸张在版本鉴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不同材质的纸张呈现不同的颜色。例如,麻纸分为白麻

纸和黄麻纸,白麻纸色泽洁白,黄麻纸纸色略黄,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刻本多用黄麻纸。虽然也有部分再造善本采用了彩印的方法,但其他绝大多数再造本的纸质色泽都统一为白色。例如,再造本《洪范政鉴》(宋淳熙十三年内附写本)中大字工楷,朱栏手绘,纸略陈黄,精雅无比,而且部分原底本为金镶玉装帧的纸质略黄,以便将“金”与“玉”相区别,这是再造善本无法体现的。笔者认为,正如著名学者冯骥才对于古迹“整旧如旧”的推崇一样,古籍再造中如“对其古老面貌原封不动,甚至加倍珍异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痕迹与细节”^[9],不仅能使中华孤本秘籍分身有术、源远流长,也能使历史受到尊重。当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各种珍贵古籍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原貌展现,古籍原有色泽也无法全部通过彩色印刷表现出来,这时应在其附加信息中对底本与再造本的色差进行说明,为研究人员提供版本鉴定方面的信息和想象空间。

3 结 语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乃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之举,其功实可用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字子厚)之言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仍在继续,望拙文能为这万世之功添微薄之力,而笔者学微识浅,文中定有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顾广圻.思适斋集: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G]//徐渭仁.春晖堂丛书.上海:出版者不详,1861.
- [2] 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清话序[G]//叶德辉.园先生全书.长沙:中国古籍刊印社,1935:1.
- [3] 巩本栋.东亚视野下的宋代文学史料研究[J].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7(4):241-268.
- [4] 继续存真 传本扬学: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访谈录[EB/OL]. [2010-03-03].<http://art.people.com.cn/GB/14759/21864/3754258.html>.
- [5] 杜伟生.敦煌遗书用纸概况及浅析[G]//林世田,蒙安泰.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67-77.
- [6] 邱晓刚.读《纸鉴》后有话要说[N].中华读书报,2004-11-24(8).
- [7] 萧 统.中华再造善本:梁昭明太子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
- [8] 张 平.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EB/OL]. [2010-04-11].<http://www.nlc.gov.cn/hxjy/zhangping.htm>.
- [9] 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81-83.
- [10] 张 载.张横渠先生文集:近思录拾遗[G]//正谊堂全书.福州:正谊书院,1866.

[作者简介]

王阿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现工作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已发表论文9篇,参编著作1部。

[收稿日期:2010-12-09]